



教育部“211工程”项目

“五反”

WUFAN

运动研究

YUNDONG YANJIU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组织编写

何永红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党史研究丛书

“五反” 运动研究

何永红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反”运动研究/何永红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4

(中共党史研究丛书)

ISBN 7—80199—372—1

I. 五… II. 何… III. 三反五反运动—研究

IV. D651.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312 号

书 名:中共党史研究丛书 “五反”运动研究

作 者:何永红

责任编辑:李亚平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密兴印刷厂

开 本:异 16

字 数:256 千字

印 张:16. 2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372—1

定 价:28.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本书为教育部“211工程”项目

中共党史研究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组织编写
王顺生 杨凤城 齐鹏飞 主编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章 “五反”运动前的中国共产党与私人 资本主义	17
------------------------------------	----

一、“五反”运动前中国共产党的私人资本主义理论的 历史演进	17
--	----

（一）党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的 初步认识	18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私人资本主义理论的提出 ...	20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私人资本主义理论的形成 ...	23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私人资本主义理论的 新发展	25
-----------------------------------	----

（五）建国初期党的私人资本主义理论的进一步 发展	28
-----------------------------------	----

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处理与私人资本主义关系的 实践	32
-------------------------------------	----

（一）第一次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	32
-----------------------	----

（二）第一次调整工商业	35
-------------------	----

2 第二章 “五反”运动的展开	41
一、什么是“五毒”	41
二、“五反”运动的发动	45
(一)“五反”运动发动的原因	45
(二)“五反”运动发动的条件	59
三、“五反”运动的过程	61
(一)检举揭发、坦白交代阶段	62
(二)定案处理阶段	64
四、“五反”运动在上海	67
 第三章 “五反”运动的政策和策略分析	79
一、“五反”运动政策的制定	79
(一)“五反”运动政策的制定及其依据	79
(二)“五反”运动政策的几个中心问题	87
二、“五反”运动的斗争策略	93
(一)团结多数、孤立少数	93
(二)利用矛盾、实行分化	96
(三)把握方向、适时调整	98
(四)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	102
(五)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108
三、“五反”运动政策的执行	112
(一)“五反”运动政策对象与政策执行	113
(二)“五反”运动政策执行者与政策执行	123
(三)“五反”运动政策宣传与政策执行	130
四、群众组织和部分民主党派在“五反”运动中的作用	142
(一)群众组织在“五反”运动中的作用	142
(二)部分民主党派在“五反”运动中的作用	156
 第四章 “五反”运动的经济分析	161
一、“五反”运动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161

(一)工业中公私经济比重的变化	161
(二)商业中公私经济比重的变化	163
(三)私营金融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167
(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	171
二、“五反”运动对私营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	174
(一)国家对私营经济宏观调控的全方位加强	174
(二)私营经济内部管理体制的变化	190
三、“五反”运动对劳动就业、工资和劳动保护政策的 影响	199
(一)就业政策单一计划管理体制的形成	200
(二)政府对私营企业工资分配制度的调整	202
(三)职工劳动保险及劳动保护的改善	205
 第五章 “五反”运动的反思	209
一、“五反”运动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209
(一)“五反”运动的政治意义和作用	209
(二)“五反”运动的经济意义和作用	214
(三)“五反”运动的社会改革意义和作用	215
(四)“五反”运动对毛泽东关于私人资本主义 认识的影响	217
二、“五反”运动的历史局限性	221
(一)在斗争性质上,“五反”运动被当作一场 阶级斗争	221
(二)在斗争形式上,“五反”运动采取了群众运动的 斗争方式	223
三、“五反”运动的历史启示	229
(一)正确认识现阶段私营经济的两面性,依法对其 加强监督和管理	229
(二)坚持群众路线,不搞群众运动	234

（三）清除党内腐败必须与查处社会上的不法活动 紧密结合，进行综合治理·····	236
--	-----

（四）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努力推动依法治国的 最终实现·····	238
------------------------------------	-----

参考书目·····	247
-----------	-----

后 记·····	253
----------	-----

序 言

“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为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勤政廉洁,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严重违法行为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打击不法资本家违法经营行为的群众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已过去 50 多年了,今天,我们回顾半个世纪前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对于在改革开放形势下进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处理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的状态下,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之间的关系、新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和其他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深入研究具体问题之前,笔者先扼要地介绍一下“五反”运动以及对“五反”运动的研究情况,以便读者对“五反”运动先有个总体性的把握和了解。

一、什么是“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是指 1952 年初,在“三反”运动的高潮中,经毛泽东提议,在全国大中城市,为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国营经济、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而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这场斗争,在当时是打击资产阶级违法活动的重大措施,取得了重大胜利。

二、“五反”运动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五反”运动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的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把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在《共同纲领》的范围内,在当时不仅是个经济领域的问题,同时也具有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意义。

(一)“五反”运动的政治意义和作用

“五反”运动树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优势,促进了国家政权建设,打击了资产阶级的“五毒”,扫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一,“五反”运动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树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优势。

“五反”运动,对职工群众是一次空前广泛与深入的发动。这次运动中,广大的工人、店员是运动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五反”统一战线的主体。运动开始后,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依靠工人阶级,从检查、揭发到最后定案、处理,从工人监督生产经营到私营厂店的民主改革,各个环节都要由工人“把关”,工人群众始终活跃在运动的第一线,他们亲眼认清了不法商人唯利是图、在“钱眼里翻跟头”的种种伎俩,认清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本质。这使得经过“五反”运动教育的工人、店员,阶级觉悟普遍提高,他们在现实的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切实感受到了工人阶级才是新中国的领导阶级。面对那些被打掉威风的资产阶级,工人店员们不禁感叹“我们在这次运动中才真正翻了身,真正做了主人。”^①另外,从巩固新政权的阶级基础这一角度看,“五反”运动前,共产党要求资产阶级遵守《共同纲领》,主要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来调控,而缺乏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五反”运动改变了这种状况,工人阶级、人民大众思想觉悟空前提高,对私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监督和管理,已不是单纯的国家行政部门的事,而是把国家的领导与私营企业内部外的人民群众的监督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巩固了人民政权的阶级基础。

^① 《新华社新闻稿》,1952年4月24日,第637页。

第二,“五反”运动促进了国家的政权建设,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首先,“五反”运动治理了党的建设的外部环境,对于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侵袭,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运动中对“五毒”的集中揭露,让共产党人认清了“糖衣炮弹”的面目,增强了自身的免疫力。

其次,“五反”运动纯洁了政权的组织。不法资本家在运动中从政权中被清洗出去。1952年在司法界进行了一场广泛的司法改革,在《驳斥法律界党与非党之间》一文中提到:“司法改革一开始,大批从五反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人积极分子参加了法院工作。他们从实际斗争中锻炼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强烈的阶级感情,他们拥护党、热爱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忠心耿耿,由他们代替了思想上还不能从《六法全书》里解放出来的旧司法人员,从思想上到组织上纯洁了法院内部”。^① 济南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 51 人,有问题者 10 人,已逮捕法办者 8 人(均系工商界代表)。合肥市全市共 69 户严重户和完全违法户,其中 2/5 是工商界代表。^②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必须大胆地、大量地提拔“五反”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优秀代表,把他们充实到人民政府中来。“对其中特别优秀的,有培养前途的应越级提拔,打破过去组织制度上的不合理现象。”^③许多积极分子在运动中加入了党组织,走上了党的各级领导岗位,这批干部就是后来俗称的“三五”牌干部(50 年代初参加工作、入党、提干)的一部分,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骨干力量。因此,“五反”运动使人民政府去腐生肌,更加健康有力。在此基础上,共产党还大力整顿了工会、青年团等组织。“五反”运动前,私营企业工会组织不纯,制度混乱,民主生活缺乏,《工会法》贯彻不下去。资产阶级采用各种办法来阻止工人加入工会,或采用“派进来”、“拉出去”的办法来把持工会。如“广州市私营企业工会中,工会被资本家掌握利用的达 50% 左右,完全为资本家篡夺领导权的竟达 10% 以上。”^④另据北京市总工会重点检查,一区四个行业私营企业组联会连基层在内 102 个干部中,有 10 个是“狗腿子”。七区 10 个行业私营企业中组织员以

① 《法学》,1998 年第 6 期。

② 《中南政报》,1952 年第 23 期,第 3 页。

③ 《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9 日。

④ 《中国工运》,1952 年第 4 期,第 22 页。

上的干部 594 人,有 24 个是“狗腿子”,两个区平均“狗腿子”约占 6% 强。^①“五反”运动清洗了工会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处理了被不法资本家收买利用的干部,纯洁了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并且结合运动大力发展会员,健全基层组织。根据华北、华东、西北、东北地区 60 个城市的统计,“五反”运动前私营企业工会会员 1608673 人,占职工人数的 74.2%，“五反”中会员共达 1833678 人,占职工总人数的 84.53%，增加了 10.33 个百分点。^②这就为国家进一步控制私人企业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巩固了私营企业中工人阶级的阵地。共青团的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壮大。运动前,全国店员中青年店员占 40%—50%，但团员数量很少。在天津 7 万多的店员中,青年店员有 3.5 万人,而团员仅 600 人。^③运动中,共青团组织结合斗争形势,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向广大青年发出了“争取火线入党”、“争取‘五反’运动中立功入团”的号召,改变了私营企业中团组织发展缓慢的情况,使团组织迅速发展。如江苏镇江市在运动中涌现出了 2658 名积极分子,其中 198 人在斗争中入了团。^④经过“五反”的锻炼,壮大的青年团开始真正成为共产党的得力助手。

第三,“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和嚣张气焰,是对私营工商业者的一次思想改造。

上述两个方面从工人阶级和国家政权的角度分析了“五反”运动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从对资产阶级的影响来看,“五反”运动又成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朝夕之事。“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违法行为,严惩了罪行严重的资本家,进一步限制了私人资本主义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使资产阶级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他们在实际斗争中体会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许多人认识到反对工人阶级、反对人民政权是没有出路的,斗争的结果是他们甘心服从工人阶级、国营经济的领导,遵守《共同纲领》。

首先,“五反”运动直接导致了资产阶级对自身价值判断的变化,他们不再

① 河北省档案馆 888—1—11。

② 《中国工运》，1952 年第 4 期，第 22 页。

③ 《中国青年》，1952 年第 4 期，第 16 页。

④ 《“三反”、“五反”运动》江苏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36 页。

认为自己是社会上受人尊重的人,不再认为自己是新政权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五反”运动前的自信和自重完全被自卑感所取代。运动中的整个资产阶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斗争、教育。面对被发动起来的强大的工人阶级,违法的资本家不得不向工人低头认错,有的当场焚毁“关书”、“保单”,他们开始普遍抱怨自己的阶级成分不好,怕被别人称呼为“资本家”,害怕再扮演“资本家”的角色,他们过去作为有产者与企业经营人员而具有的自信心与安全感遭到致命打击,并对自己所属的阶级集团的未来产生了心理上的恐惧感,有的资本家家属希望要去掉“资属”这顶帽子。“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威力所压倒。”^①其“精神上的自卑与经济力量的日趋减弱,共同导致了工商业资本家独立人格的瓦解,强化了他们服从工人阶级领导的意识。”^②从而为以后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自愿合营,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

其次,通过“五反”运动,资本家对中国必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本阶级必然要被消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五反”运动,国家在税收、价格、经营范围等方面,基本实现了对市场环境的控制,公有制在工商业领域占据了领导性和主导性地位。私有企业在产品销售与原材料获取方面都遭到了巨大的困难。这使资本家发现,自由市场的范围与规模不断缩小,在买不到原料的同时,也卖不掉产品。另外,在企业内部,原属资本家个人所有的企业产权遭到工人的分割,工会与政府对诸项权利的控制实际上使资本家已无法掌握其企业。种种因素使他们充分意识到:企业本身成了资本家的包袱而不是财产——它给资本家带来了经济上的困难、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心理上的沉重负担。并且,资本家还不能随便关闭自己的企业,他还得天天为诸如给职工发工资之类的事发愁。这样,如果能够合营的话,其实是给资本家一条生路。这样,资本家感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中国是必然要消亡的,资产阶级只有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法令,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才有光明的前途,才能将国家前途和个人前途的矛盾化解,也才有出路,而且是惟一的出路。由此可以看出,“五反”

① 《共和国走过的路》(1953—195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1 页。

② 李立志:《变迁与重构》,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7 页。

运动对资本家来说,是其建国后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五反”后越来越多的资本家表示,愿意“诚心诚意跟着党走到社会主义。”^①服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成为他们心悦诚服的选择和比较自觉的认同。

再次,“五反”运动促进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经过“五反”,使得这个在中国经济上、政治上都很弱,而且先天富于妥协性的阶级内部更加分化,有看重自己政治前途,较有远见,积极向党和新政权靠拢的,他们甚至提出要把自己的企业捐献给国家或立即实行公私合营。不少资本家的子女在大学和专门学校读书,国家供给他们生活,他们则宣告不要资本家父亲的遗产;也有处于中间观望的;不乏有反动的。这种内部的分化就使得资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再也不是以一个阶级的力量来对抗了。上述资产阶级的这些变化,在1952年10月20日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在莫斯科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是作为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需的时间和能够实现的条件写进去的,他说:“我们从现在起就一方面照顾资本家得到不太少的利润,另一方面,又动员人民反对资本家各种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违法行为。‘五反’运动揭露了资本家大量的违法行为,使他们丑态必露。但在处理时,我们又给他们以宽大的处理,多数只令其退财补税,不作处罚,只有少数违法严重恶劣者给予处罚和判刑。如此,多数资本家和政府的关系没有破裂,但资本家在政治上已经孤立,在社会上的威信大大降低。”^②中共中央在“五反”运动四年之后,即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在毛主席主持起草、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颁布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末年,即1952年的‘三反’、‘五反’的斗争,开始造成了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在‘三反’、‘五反’运动以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工人阶级还没有对于资产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很大的威风。‘三反’、‘五反’的斗争唤起了工人阶级的高度自觉,打退了资产阶级用‘五毒’行为向国家机关和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使资产阶级原有的威风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扫地以尽;在一部分中小企业中资本家虽然还有一些余威,但是也比过去大大低落了;这就使得工人的监督

① 《刘少奇论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227页。

从此在很多企业中逐步地建立起来,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说明:在彻底打倒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后,“五反”运动进一步改变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这个对“五反”运动意义的基本估计,在今天看来,也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反”运动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不可能再照旧生存下去,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没有别的选择。”^①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反”运动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步骤。

(二)“五反”运动的经济意义和作用

“五反”运动促进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重组,初步改变了私营企业的性质,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加强了国家对私营经济的调控,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日后开展的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这在第四章中会有专门的分析,在此不赘述。

(三)“五反”运动的社会改革意义和作用

“五反”运动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是一次成功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基础。

建国初期,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变迁与重构的时期,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的实施,必然产生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而这样的一个新社会,是要有自己的精神风貌作为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新社会,也必然不允许旧社会的陈风恶习存在。“五反”所反的“五毒”,某种程度上就是旧社会的一些恶习的延续。在“五反”运动中对工人群众的宣传、发动和阶级教育,其效果绝不仅仅是让工人看到和清算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而是对整个资产阶级的丑陋本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朽有了从未有过的认识。所以,从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这一角度讲,“五反”运动中所营造的强大的社会舆论便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力。

第一,“五反”运动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揭发和批判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了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使全国人民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通过“五反”运动,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反动、腐朽本质,在全国人民面前充分暴光,“五毒”行为,成为全社会指责和唾弃的对象。过去人们认为投机取巧、钻营牟利、蝇营狗苟、拉拢权贵、损公肥私、盗窃国家财产是“聪明能干有本领”的旧观念,在中国破天荒地受到了一次认真的群众性清算,资产阶级开始威风扫地,工商业中一种诚实守信、守法经营的营业道德正在逐步培养起来。

“五反”运动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来说,在解放后强烈的翻身意识的基础上,他们的阶级意识更加明确,精神状态更加扬眉吐气,主人翁意识、领导阶级的责任感顿增。“五反”运动还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清除了工人中存在的羡慕和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思想,树立了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新的社会风气。此外,劳动意识也获得显著增强。在“五反”期间,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开辟专栏,发起了对“杨大业思想”的讨论。所谓“杨大业思想”,是报社同志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一种以“为吃饭而干活”的观念,以“杨大业”的虚拟名字在报上发表的一篇“反面”文章,以便引起讨论。一时江城出现了讨论的热潮,许多人纷纷写文章向报社投稿,抒发己见,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及为革命无私奉献的忘我精神,提倡工作不讲条件及劳动不计报酬的劳动态度。“剥削可耻,劳动光荣”,为人民服务,已然成为新社会的又一新时尚。

这一时期人们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还突出表现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扬。对不法资本家“五毒”的揭发,更加激发了人们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热情。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从1951年6月到1952年5月,全国人民捐献的款项可购买3710架战斗机,无数的慰问信、慰问品源源不断地寄往朝鲜前线。同时,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把爱国热情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增产节约劳动竞赛运动。

第二,通过“五反”运动,有效地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风恶习。“五反”运动促成了全国禁毒运动的开展。新中国建立后,政务院曾于1950年2月24日颁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在全国掀起第一次禁烟高潮,但此后城市居民中吸食鸦片现象仍较普遍。大量的烟毒大案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揭发出来,如察哈尔省通过群众检举,挖出了“昌记号”贩毒集团,抓

获毒犯 20 余人。北京、锦州、沈阳、天津、上海、太原、西安、衡阳等地及公安系统在人民群众的检举揭发中,也破获了一大批贩毒制毒大案,如衡阳铁路局贩运毒品人员达 2000 人以上,贺××贩毒证据确凿者达 1 万余两。^① 于是,在“三反”、“五反”运动的基础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于 1952 年 3 月、4 月,连续发出指示,“把禁毒运动作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时期的一个主流,……这个运动应在五月底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②,要继续发动群众揭发深挖,严肃处理已查出的犯罪人员,尽快铲除烟毒这种丑恶现象。全国人民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这次运动截至 1952 年 12 月,共依法处理毒犯 51627 名,缴获毒品(折合鸦片)339 万余两。^③ “五反”运动有效地推动了禁毒运动。

同时“五反”运动也成为当时横扫赌风的一股劲力。摸牌赌博在中国算是一种古老的恶习。它比贪、赌、娼更广泛、更顽固地危害着人们,破坏着党风、政风、民风。“三反”、“五反”中揭发出来的几个典型事例足以说明这一点。有位姓张的科长,掌管着价值约 480 多亿元的采购大权。他虽为党员、干部,但赌博的旧习始终没有彻底改掉,因长住上海,从小赌结识了三位老板,他们为了拉他下水,越赌越大,还有意将上千万元的钞票输给张。这时,开口要跟他做生意,张科长只好答应买他们的货。这三位奸商用以次充好,抬高物价、开假发票等手段,共从张科长这里多捞了国家 90 多亿元,还不算他们的那些次品用在施工中造成的返工、报废,工人死伤等事件带来的损失。不法资本家就是这样把引诱国家干部赌博作为一种行贿的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干部,借此达到偷逃税款等目的的。“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没有把狠杀赌博风作为一项专门斗争进行,但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仍作为重点禁止的内容进行检举、揭发、打击,为此在中国有数千年历史的赌博之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样得到了彻底地扫除,同样与反贪、禁毒、禁娼工作列入了世界之新的崭新记录。”^④

① 《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30 页。

② 《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37 页。

③ 张加华:《两次中国革命对中国社会风俗影响之比较研究》,《淮阴工程学院学报》,2001 年第 4 期。

④ 高士振:《难忘岁月》,《档案架》,1978 年第 25 页。